

中国诗人
随笔系列

·
福建卷

被骨头知道

鲁亢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鲁亢

福州人，生于20世纪60年代，供职于福建省对台办公室《海峡了望》杂志社，现为编辑部主任。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发表于《青年作家》《今天》《中西诗歌》《福建文学》等刊物。曾获《诗歌月刊》诗歌奖。

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

被骨头知道

鲁亢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骨头知道 / 鲁亢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
2015.11

(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· 福建卷)

ISBN 978-7-5525-2273-0

I. ①被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7497号

被骨头知道

鲁亢 著

责任编辑 贾 莉
封面设计 蒋 浩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
阳光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5842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1253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10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2273-0/I · 638
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走向“文学广场”的诗人们

曾念长

就文学体式而言，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。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，我斗胆说：公共性。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，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。所以，诗人、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，学者、医生、演员、商人和官员，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，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邐（卡邐：福州地区方言，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，意指闲逛、溜达）一番。它是文学的“公共广场”。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，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，只要来到这个广场，大家就享有同等的“文学身份”，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，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。

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，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：抒情性和议论性。在农村，村庙就是广场。每逢佳节，村民在此狂欢；但逢大事，族人在此定论。在城市，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，在放大，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。君不见，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散文和随笔，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“文学广场”，也有双重属性，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

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。

一般而言，散文重抒情，而随笔重议论。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，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。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。通过他的海量写作，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了出来，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。显然，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，隐含着特定的诉求：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。其结果是，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。不过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：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，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；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，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，发展为随笔写作。于是，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，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。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，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，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“文学广场”上的交响曲。

这套丛书名为“中国诗人随笔系列·福建卷”，那么，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，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“文学广场”中给予具体考察。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，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“文学广场”，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。似乎有人说过，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。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。如果“查无此人”，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。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，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。随笔就是我们这

个时代的“文章”，可长可短，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，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。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，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、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。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，唯独如此，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。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“散文文化的写作”，它是“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”，其“出发点可以是诗的，也可以是小说的、戏剧的，等等”。我理解于坚所说的“散文文化的写作”，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了的随笔。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，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。这种写作本身，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。

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，福建是一个“诗歌大省”。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，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。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？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？但我以为，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，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。从历史上看，闽人文学长于诗文，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。其中的原因，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。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，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，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。这一说法或许不假，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“内排遣”传统。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。他们往往向自

己的内心，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。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，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。他们习惯性地神像前喃喃自语，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象一问一答。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，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。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，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。闽人对诗歌、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，或许正是缘于此。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，不是北京人的段子，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。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，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，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。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，在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，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以蔡其矫、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，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，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

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，今天的福建诗人（也包括批评家）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。如厦门的舒婷、陈仲义，福州的吕德安、鲁亢等。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，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。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，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

种心灵隐喻。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，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，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，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“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／隐士却不在家”。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，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。但我还想说的是，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，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。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，介入公共事物，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。在此意义上，我们这个时代不乏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国内同行。比如于坚，这位自称“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”的云南诗人，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，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、建筑与城市、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。再说王小波，他不是诗人，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，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，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。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。诗人不仅仅是诗人。他首先是个人，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，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。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，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，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。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。正如前文所言，随笔是“文学广场”，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，也是诗人出来卡邇的绝佳场所。

我想这套丛书的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，因此才有“诗人随笔”一说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“副产品”。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，我想他们对自己的“副产品”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。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，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。所谓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。我更想借这个机会，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。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，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。这种“路径依赖”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，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。一位学者来到广场，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，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，甚至与自己“死磕”。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。依此类推，诗人出现在广场，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。他们左顾右盼，略带神经质，却不愿参与任何“群众聚会”，就像传说中的“打酱油”者，一溜烟又飘走了。我作此类比，仅仅是想说明，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。诗人最关心的，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即便是写随笔，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！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，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？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。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。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，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。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，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

视，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，再和盘托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。

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，算是老读者了。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。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，我却读得较少。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，当作一次发现之旅，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，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。

（曾念长：文学博士，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。）

目 录

第1部分

长崎今日雨后 / 002

坐在我身边的女性 / 009

没有怜悯的世界 / 017

日语课 / 024

他们把我赶出村庄 / 033

第2部分

被骨头知道 / 042

影子在这块红石下 / 049

像父亲一样沉沦 / 056

看望死者的雨夜 / 065

第3部分

写作，电影 / 074

碟人日记：那你说吧，语言相通又怎样 / 084

越过日界线死去 / 090

有时读书，有时看粗俗的电影 / 094

躲到一边去的人 / 099

像我妈妈的女人 / 103

有关《贤伉俪》，或伍迪·艾伦的结局 / 108

你以前缺什么？ / 112

——《男人四十》及其他

你会跟孩子一起去看吗？ / 116

扯到一部电影中的“诗人形象” / 121

狗日的真实 / 125

——观原创小剧场话剧《无人在场》

一出话剧会使什么事情发生 / 130

——写在《纪念碑》上演之后

第4部分

自闭：拒绝日常生活的神奇想象 / 136

“这么好的诗我把它写完” / 143

在这些诗句中，我没有时间了 / 146

我的时间锈斑 / 149

写在《世界末：散记》的页边 / 161

因为热爱，他像诗人一样工作 / 166

“一夜无梦”·哀歌 / 171

那年初夏 幽暗一日 / 178

后来 / 182

致诗人弱拼 / 185

致子梵梅的一封信 / 190

鲁亢

| 中国诗人随笔系列 |

福

建

卷

被

骨

头

知

道

[第1部分]

长崎今日雨后

宽阔的公路中间绵延着铁栅栏，她们有的靠在上面，有的站在一旁，手里提着串连成圈的茉莉花。车等红灯时，她们迎上去，晃着，兜售茉莉花。我的日语老师如能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想必先“啊”地惊讶，然后举起照相机。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来到中国，北京、上海，有几次她举起照相机，被“有关人士”喝令“不能拍”。在课堂上她形神兼备地提起这件往事。我很想听下去，听她的评论，但却不可能，除非我们私交甚笃。中日建交后来了一些日本人，其中有一些还满怀“革命者的朝圣的热情”。他们受惊于这个在当时管制严酷，色彩单调，贫困落后的国家，而且它的肆无忌惮的苍蝇一视同仁地骚扰他们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。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来了，还去了中南海，他似乎无意于讨论这种形而下的问题。在他看来，帝国还是帝国，只是空余“龙的骨架”，但阴郁潮湿，等级森严，又“深不见底”。

我跟日语老师不过是在课堂上碰碰面，我不知道她的姓名。她只能在教外国人的初级语言学校授课，也实在不必对那些学生太过熟悉。他们前途有限。他们整天忧虑的是“我怎么才能一直留下来”。

而这样的学校无非用来过渡。

那些卖茉莉花的妇女在本城只出现了一天，她们的生意带有“行为艺术”的嫌疑，既危险又夸张，城管不会坐视不管的。

长崎多山坡，白天能见到警察独自骑着单车晃来晃去。晚上则一队人打着手电筒在巡逻。日本之所以治安无大碍，与警察的见面率颇高有一定的关系。

我在尽量不让人知道的情况下飞往长崎，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。几乎所有知道的人，都认为我找到了一条淘金之路，未来的“万元户”。我也认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走，打工赚钱去。但我还是有点与此不同的幻念，以至于这种幻念渐渐占了上风。“我要逃离这座村庄，不回头，以死为誓。”其自我期许的坚定意志如爱伦·坡的《乌鸦》，每一段最后一行的“鸦噪”——“永不复返”。我年轻时读过一点东西，有人写到19世纪美国的一位画家，将彻底离开出生地看得很重，极合我的心思。你兴许可以找到比这更绝望的例子，我可找不到，我也不太相信能够实现这一梦想，但我日思夜想，逃离村庄。

我的行李中有蔡志忠的中国古典著作的漫画，奥迪塞乌斯·埃利蒂斯的《英雄挽歌》，我的幻念中的一小部分：阅读、写作，像兰波似的“天才地毁灭”，或者更好；像马拉美，优雅、精致、博学，于诗艺，于生活，过得忧郁的实在。

黎兄曾浅浅地责备过：“听说还上了日语班，怎么日语这么

差！”我也有点焦急。在这座小城日语好的外国人都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，而你，一个瘦小的看上去有点像书生气却没有语言天赋的穷光蛋，打算吃谁的免费午餐？

黎兄健康、帅气，公派留学生，住着山上的较为宽敞的公寓，家具齐全。他临走前还说要把家具送给井上博行（我的担保人），后来“井上还是有点为难，日本人不好意思……”

我已经渐渐忘记了在那里碰到过的人。前几年我偶尔还会问“他们怎么样了？”礼节性的，叶公好龙式的。现在我要去搜索，人物才浮上来。也没有人要来与你叙旧，然后“话新”。我就像《母亲》这部日本电影中的“一个月的临时母亲”，她耐着性子照顾孩子，询问“结婚还是不结婚”，私下里在找房子要搬出去。我一个人鼓起掌来。太对了！

与人交往纯属多余。“没有人愿意因自己的缺点而被人怜悯”，而优点，假如有的话，又不够分量。更糟的是，我还真信了“没有成为巨人的并不需要满足于做一个矮子”的类似这样的“格言”。我一度走不出《英雄挽歌》的悲情之调：“哎呀，山鹰问，那个年轻人哪里去了？/于是所有的小鹰都惊讶那个年轻人哪里去了。/哎呀，母亲悲叹着问，我的儿子哪里去了？/于是所有的母亲都惊讶她们的孩子哪里去了。”我们能哪里去了呢？塞在冷冻车里越过边界？在飞机上冲掉护照飞过边界，挤在船舱里渡过边界，还是一脸严肃的傻气走在长崎的街上？